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二十三期 1996年7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23, July, 1996.

有關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 四種誤解

林滿紅

Four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by
Man-houng 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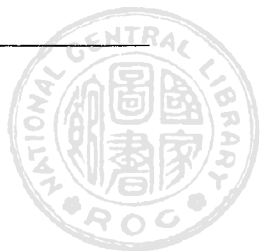
關鍵詞：歷史記憶、殖民社會、東亞經濟史、台灣經濟史

*Keywords: Historical Memory, Colonial Society, East Asian Economic History,
Taiwan Economic History*

投稿日期：1996年3月1日；通過日期：1996年6月3日。

Received: March 1, 1996; in revised form: June 3, 1996.

作者通訊地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 要

本文指出一般社會對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四種誤解：

(1)台灣的經濟發展源起於日據時期；(2)日據以前的發展根源為台灣相對於大陸特有的傳統；(3)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發展全由日本政府與日商所把持；(4)日據時期對戰後的影響很小。相對於這些誤解，本文指出：日據時期台灣經濟的發展有日據以前的台灣所留下的深厚根源，這種根源還是中國幾千年農商並行發展的傳統的一個延伸。這個傳統在日據台灣時期與日本政府在台灣發展以農商為主的經濟政策互相奧援，而為戰後台灣留下一個相當深厚，而且是與現代農商經濟飽受戰爭摧殘的中國大陸迥然不同的經濟基礎。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four common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They are: (1)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itiated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2) the historical origin for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or to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as unique for Taiwan as compared with mainland China; (3)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has been fully monopolized by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Japanese merchants; (4) There remains few heritage from the colonial rule to postwar Taiwan. To halt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re remains deep historical legacy from pre-colonial Taiwan to colonial Taiwan; such historical legacy can be traced back to mainland China's development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such legacy was reinforced by Japanese colonial policy which emphasized the grass-root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It left postwar Taiwan a much more abundant heritage than mainland China in the same period which had been seriously ravaged by war.



本文目的在於根據學界之相關研究，指出一般社會對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四種誤解：

1. 台灣的經濟發展源起於日據時期

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源起於日據時期的人，多半是受二次大戰戰後初期社會理論影響較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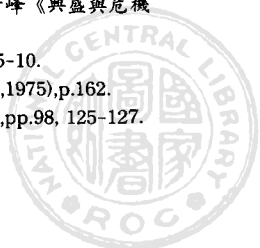
戰後初期各國的社會理論，有些國家延承戰前的馬克斯學派理論，認為傳統社會是封建社會，「封建」兩字幾乎是「落後」兩字的代名詞。自 1930 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之後，一直到最近常被討論的《興盛與危機》都有這種看法。¹連日本早期的馬克斯論者也提過「亞細亞社會停滯論」。²西方各國的經濟發展學者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由於對低度開發國家的歷史不夠了解，往往以為低度開發國家的傳統經濟是停滯不前的。³對美國與台灣影響極大的社會學者 Talcott Parsons，其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等等二元對比，也把傳統放在受貶抑的一方⁴。從 Joseph A. Schumpeter 寫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Y:Harper, 1942) 到 Fred Hirsch 寫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ress, 1976)，西方的社會理論很少對現代社會的優越性感到懷疑，因為在 1945 至 1970 年間西方世界經歷了非常持久的經濟穩定成長與政治安定。一直到 1970 年代，經濟穩定成長與政治安定的局面，不復長期存在，社會科學理論

1. Benjamin I. Schwartz, "A Marxist Controversy on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XIII, Feb. 1954, p.143-153;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Albert Feuerwerker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台北: 古風出版社, 1987)。

2. 田中正俊,《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序說》(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頁 5-10。

3. E.E.Hagen,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Richard D.Irwin, Inc.,1975),p.162。

4.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Free Press, 1951),pp.98, 125-127。



才對現代社會提出較多的質疑，對傳統也轉而產生較為正面的看法。⁵此時，在西方的西洋史研究方面，也開始批判把歷史看成是直線發展、現代比過去好的惠格派歷史解釋（Whig Interpretation）⁶。在西方的中國史研究方面，也由傳統停滯論轉而重視傳統的動力⁷。這樣的學術趨勢仍不斷在擴大之中。這由早期認為儒家文化是中國落後的根源，到現在認為儒家文化是亞太經濟崛起的一個精神支柱可見一斑。

上述戰後初期的社會理論也認為，現代經濟發展以前的傳統經濟是停滯不前的。所謂現代經濟是利用十七世紀以後歐洲發展的現代科技於生產、分配、消費的經濟發展階段⁸。就台灣而言，現代科技之運用於經濟活動，日據時期的確重要。尤其是就產值而言，台灣經濟一直到1950年代以前，都以農業為主⁹，而科學農業的發展，是由日據時代開始：蓬萊米等新品種的研發、化學肥料、農產加工廠、農業實驗站、農業學校的引介等均為其例¹⁰。

但就工、商業而言，清末有劉銘傳等地方官僚推促的自強運動，在煤礦開採、鐵路、電報、輪船等方面已引進了現代科技，同時，晚清時期已看到較多的商業契約，一些較專業化的商業團體已經出現。¹¹

5. A.O.Hirschman, "Riv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ket Society: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X :1463-1484 (Dec. 1982), p.1470.

6. Bernard Bailyn,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Feb.1982)。

7. Philip C. C.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17, No.3, 1991; Paul A.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8. Simon Kuznet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eed* (New York: Feffer&Simons Co.,1966), Ch.1。

9. W.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台灣雙葉書局翻印本, 1979), Table 1.10。

10. 林滿紅, 〈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 《史學評論》, 期1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9年7月), 頁188-193。

11. 林滿紅, 〈清末大陸來台郊商的興衰——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 《國科會研究叢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卷4, 期2 (1994年7月), 頁181。



甚而，日據時期台灣的財稅收入結構與日本本國之以田賦為主不同，而以關稅、專賣收入等間接稅為主¹²，也有晚清的根源¹³。

當然，就整個日據時期的台灣而言，整體經濟是更加發展。不過如以同受日本統治的朝鮮與台灣互相比較，就 1937 年每人國內生產淨值而言，如以日本為指數一百，台灣為五十五至六十，朝鮮為三十至四十¹⁴。研究過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學者，很多都提到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相對日本殖民的朝鮮人民具有經濟理性，只要是利之所在，不必訴諸政治的驅迫，就願嘗試新的技術或經濟發展機會。¹⁵1911 至 1938 年間，日資較少有機會介入台灣的米穀流通過程及 99 人以下之中小工廠的餘地；反之，日資則主導朝鮮的這些產銷部門。¹⁶雖然日本政府早在日本本國、朝鮮、滿洲設立商會，但遲遲不敢在台灣成立，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唯恐台灣本土的商人相對其他殖民地的本土商人勢力雄厚，有從事民族運動之虞¹⁷。因此在日本佔領台灣以前，台灣社會本身原已厚實的經濟發展潛力，不可忽視。

2. 日據以前的發展根源為台灣相對於大陸特有的傳統

相對於前述的經濟發展學者，有一派學者對傳統有較多的了解，他們體察到日本統治台灣當時，台灣已有深厚的市場取向性格以及私有土地、合股、複式簿計、產品的買青賣青（作物未長成時先予農民預付款以確定貨源）等等商業制度。日本政府在舊瓶裝新酒，而非全

12. 林滿紅，〈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前引文，頁 180。

13.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台灣研究叢刊第 115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8 年 5 月），頁 78-80。

14. 山本有造，〈日本植民地經濟史研究〉（日本：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 年 2 月 10 日），頁 121-122。

15. 林滿紅，〈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頁 171。

16. 趙祐志，〈評山本有造，〈日本植民地經濟史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十七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 3 月），頁 62。

17. 趙祐志，〈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1895-1937）〉，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6 月），頁 321-333。



盤改造的政策方向下，充分利用這些歷史基礎。這些看法雖然是正確的，但這派學者非常強調這種深厚的市場取向性格為台灣相對大陸所特有。

在 1895 年之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原住民的貢獻，如大甲蓆、大甲帽的編織技術來自通霄一帶的原住民¹⁸，也有荷蘭人、英國人等的貢獻，如荷蘭人引進的芒果¹⁹，英國人引進的電報機、鋸木機、石油與煤的鑽探技術等等²⁰。但大致說來，1895 年以前，台灣所累積的生產技術與經濟制度，主要是由大陸引進。如台灣的私有土地制度源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確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²¹

固然，至 1895 年之時，台灣的每人平均貿易額已達五海關兩（一海關兩 1900 年時約可買三十斤米），中國大陸至 1910 年時才一海關兩。²²但這只能說台灣的每個人較大陸的每個人有發展市場經濟的機會，而不能說台灣人民的市場取向性格比大陸濃烈。以東北在 1905 至 1930 年代間三度提升其榨蔗技術，來與 1890 年至 1895 年期間台灣拒絕採用現代的榨蔗技術（鐵磨），而沿用傳統的榨蔗技術（石磨）互相對照可略加了解。使用鐵磨的固定成本（設備購置費）和變動成本（工資、折舊等）小於石磨的變動成本，依照熊比德的技術引進原理，應該換用鐵磨，1890 至 1895 年間的台灣沒有引進鐵磨，是因為當時台灣

18. 郭金洞等，〈大甲帽蓆專輯〉（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85），頁 7，45。

19. 王禮陽，〈台灣果菜誌〉（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

20.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Annual Trade Reports, Tamsui (1877 年等)。

21. 參見：林滿紅，〈中國傳統經濟的特徵〉，《人文社會科學通訊》（台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指導委員會，2:5，1992 年 2 月），頁 64-66；林滿紅，〈光復以前台灣對外貿易之演變〉，《台灣文獻》，卷 36，期 3.4（1985 年 12 月），頁 55；林滿紅，〈經貿與政治文化認同—日本領台為兩岸長程關係投下的變數〉，《「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台北：聯經出版社，1995 年 9 月），頁 53，技術移轉部份。

22. 林滿紅，〈清末台灣與我國大陸之貿易型態比較（1860-189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6 期（1978 年 5 月），頁 210。



的糖市場已深受爪哇糖的競爭²³；而東北在接觸現代搾豆技術之初，亦曾有抗拒心理，但隨著德國、日本等大豆市場的大幅開展，為了應付迫切的需要，只有求助於更有效的技術。²⁴

此處所說大陸人的市場取向性格不落後於台灣，並不與前述 1895 年時台灣人的市場取向性格比朝鮮濃烈有所矛盾。商業經濟在中國原本源遠流長，貨幣制度的獨立與突出發展，市集經濟、城市經濟的發達等等為前述合夥等商業制度以外的商業經濟發展。²⁵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朝鮮的不同，實為中國與朝鮮之不同。貨幣經濟在清代中國遠比日本殖民以前的朝鮮發達²⁶，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較為突顯的經濟理性，實為幾千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果，而非台灣相對大陸特有的性格。

3. 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發展全由日本政府與日商所把持

相對於上述強調本土根源的說法，有些學者強調日本政府與日商在台灣的全盤掌控。事實上，日本政府與日本財閥在台灣的發展並未窒息台灣本土資本的進一步發展。早期學者傾向認為日本政府輔翼日商開發台灣²⁷，最近研究指出日商有大、小商人之分，大商人如三井、三菱等等財閥，固然得日本政府多方資助，但日本小商人在台灣的發展則常受日本政府限制，日據時代在台灣各地的日本中小商人甚而抱

23.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頁 35。

24. 林滿紅，〈口岸貿易與近代中國——台灣最近有關研究之回顧〉，《近代中國區域史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 12 月），頁 903。

25. 林滿紅，〈中國傳統經濟的特徵〉，前引文，頁 73-75。

26. Carter J. Eckert, *Offspring of Empire: The Kaoh'ang Kims and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Korean Capitalism, 1876-194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趙祐志、蔡明達，〈紅太陽底下的「發展」——評介 Carter J. Eckert, *Offspring of Empire* 並比較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和朝鮮的工業發展〉，《師大歷史學報》，第二十一期（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3 年 6 月）曾描述日據前朝鮮商業經濟之不發展。

27. 最代表性的著作是：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怨日本政府對台灣本地地主（有些也發展成為商人）較對他們優渥。台灣商人在 1895 年以前固然已有很多商業活動的開展，但很少到貿易對手國直接開疆拓土，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台灣商人的腳步曾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而有較多人跨出本島，在滿洲國、在中國、在東南亞展開諸多跨國經貿合作，也由日商學得一些國際促銷手法。²⁸相對地，因為日據時期由 1895 年的兩百五十五萬增為 1945 年六百萬的人口，主要是隨著農業發展而在兩萬人口以下的鄉鎮滋長²⁹，此時台灣的小鄉小鎮顯著開展，小鄉小鎮的本土商人也由日商學得開展覽會、降價求售、講求商品出貨時間、數量的控制等現代商業技巧。在廣大的鄉村，即使像嘉南大圳這樣一個訴諸龐大政府力量完成的水利工程，它所帶來的「水」，也帶給農民選種更有利作物的更多自由。³⁰在這裡，我們看到中國幾千年農商並行發展的傳統與日本政府在台灣發展以農商為主的經濟政策的相互扶持。

4. 日據時期對戰後的影響很小

由於 1945 年台灣光復之際，台灣受戰爭的影響，滿目瘡夷，1945 至 1949 年間的大陸移民，除六十萬大軍可以保衛台灣以外，其他的九十萬左右移民，有三分之二是有科技知識和行政經驗的人才，相對於前面第一項所說的日本高度影響說，有些學者強調日據時期對戰後台灣的影響甚小。戰後台灣的發展來自這些大陸人力資源投入的貢獻頗多。但最近由大陸傳出這麼一個說法，台灣所以經濟起飛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由大陸搬進了大量黃金。黃金不像紙幣之只對物資構成需求因素，而不構成供給因素。在光復之初，黃金可以用來向國外購買物資。通貨膨脹基本上是物資供不應求的一種現象，戰爭的破壞原已使

28. 林滿紅，〈經貿與政治文化認同〉，前引文，貿易對象移轉部分。

29. 林滿紅，〈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前引文，頁 194。

30. 趙祐志，〈日據時期台灣商工會的發展〉，前引文；參考：郭雲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嘉南大圳（1920-1945）〉，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6 月）。



台灣的物資有所匱乏，中華民國政府為支援大陸上的國共戰爭，供應台灣本身突然增加的一百五十萬左右人口，更使物資嚴重供不應求。固然由大陸攜入台灣的黃金曾用為 1953 年穩定物價之準備，1945 至 1953 年間台灣的惡性通貨膨脹是政府帶到台灣的物資遠不足以支應所需的直接證明。中華民國政府給台灣帶來的經濟資產主要是前述的人力資源。根據現有的數據，1953 年，台灣的平均每人年所得為一百美元以下³¹，今天的一萬多美元每人所得主要是戰後這些大陸來的人力資源與台灣人民共創的成果。即使如此，日據的影響仍然重要。

戰後台灣由日據時期承襲了鐵路、港口、公路、公營企業等等有形的資產較為一般所知，事實上，日據時期對於戰後另有諸多無形的影響，於此僅列舉數端：

在結構方面，一個經濟如能循序漸進由發展農業進而發展工業，一般較為安穩，以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與台灣互相比較，由於日本在戰前的擴張政策，北進一直重於南進，朝鮮則為日本北進的基地，其經濟發展以配合軍需發展的工業為主，農業不像台灣強調，歷年日本政府分別在台灣、朝鮮的農業投資，佔其在兩地投資的比例如表一。加總而言，1911 至 1938 年間，朝鮮人口雖約為台灣之五倍，但日本政府在朝鮮的農業投資比例約僅台灣的一半。³²戰後台灣循著戰前基礎，以農業扶養工業，除經濟逐步成長之外，所得分配也因此一直較朝鮮平均。與此相關的是日據時期也為戰後台灣的土地改革奠定初基，日據之初以股票、債券換取大租戶（擁有土地所有權而沒有土地使用權的地主）的地權。此外，日據時期的農業發展增加了擁田二至三甲的小自耕農，加上衛生改善，勞力密集農業的發展，使小自耕農努力增殖自家人口，而使部分佃農無業可就，遂轉移向城市發展³³。同時，日

31. Gustav Ran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alter 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1979), p.211。

32. 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前引書，頁 161。

33. 林滿紅，〈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前引文，頁 173。



表一：日本在台灣、朝鮮之農業投資佔其在該殖民地投資之構成比例（%）

殖民地 年代	台灣	朝鮮
1911-1915	36.86	4.35
1916-1920	28.14	3.67
1921-1925	19.29	13.76
1926-1930	30.40	21.41
1931-1935	34.52	24.72
1936-1938	20.99	12.81

資料來源：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日本：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2月10日），頁161。

據時期草根型的地方領袖逐漸崛起，也奠定戰後台灣民主政治的初基³⁴。在態度方面，日據時期大為改善的衛生條件深刻影響到台灣人的生命觀轉變得更為積極，透過教育及種種制度安排所加強的台灣人的紀律觀念，影響也極深遠³⁵。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所建立的統計制度，據戰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主任胡元璋指出：「要比日本本國強得多。」³⁶

但日據時期對戰後台灣的影響不全是正面的，如戰後初期台灣的

34. 參考：郭雲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嘉南大圳，1920-1945〉，前引碩士論文；趙祐志，〈日據時期台灣商工會的發展〉，前引文。

35. 林滿紅，〈評介陳著「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灣風物》，卷29，期4（1979年12月），頁92。

36. 《福建時報》，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三十日。



財稅收入一直到賦稅改革時期才由間接稅為主改為直接稅為主³⁷，固然有1949年以前中國大陸的影響，也有日據時期強調專賣收入、關稅等的制度餘留³⁸。又如戰後初期很多公營企業的營運績效不佳，也有日本帝國過度保護台灣企業（如糖業），以確保其物資供應的影響³⁹。當然，日據台灣對戰後台灣的最大影響，還在於日本領台使台灣與大陸的長期經貿關係由密轉疏⁴⁰，甚而使台灣與大陸分別站在交戰國的不同一邊，譬如台灣原在東南亞的茶市場因當地華僑抗日而縮減時，因為七七事變，中日斷絕關係，使東北的滿洲國不再買大陸茶而改買台灣茶，這使七七事變這樣一個大陸人同仇敵愾的事件竟成台灣人所描述的「聖戰」⁴¹。

這段台灣與大陸分別站在交戰國的不同一邊的過去，事實上也影響戰後對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種種誤解。本文所列四種誤解的前面兩種，也就是忽略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發展有深厚的中國根源的看法，較為台灣人的看法，後面兩種，也就是強調日據時期台灣人沒有發展機會以及整個日據時期對戰後台灣的影響很小的看法，則較屬大陸人的看法。

如果根據學界的研究，日據時期台灣經濟的發展有日據以前的台灣所留下的深厚根源，這種根源還是中國幾千年農商並行發展的一個延伸。這個傳統在日據台灣時期與日本政府在台灣發展以農商為主的經濟政策互相奧援，而為戰後台灣留下一個相當深厚，而且是與現代農商經濟飽受戰爭摧殘的中國大陸迥然不同的經濟基礎。

37. 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168-171。

38. 林滿紅，〈日據時代台灣經濟史研究之綜合評介〉，前引文，頁180。

39. 陳兆偉，〈國民政府與台灣糖業，1945-1957〉，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7月）。

40. 林滿紅，〈經貿與政治文化認同〉，前引文，頁53，貿易對象部份。

41. 林滿紅，〈中日關係之一糾結：臺灣與東北貿易加強的社會意涵（1932-1941）〉，《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3月），頁513-522。

